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拒绝为再次危机买单!

THE WAY TO ENRICH THE NATION

国富策

→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及其三十六计 ↗

Classical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s and
the Thirty-Six Stratagems

翟玉忠 ● 著

国内经济管理之谋 国际经济战争之策

著名经济学家王湘穗、杨斌、仲大军、胡星斗、
高梁、曹思源、廖子光 (Henry C.K. Liu)

权威联袂推荐

序一 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

我想指出的是，中国需要列国经济学，需要各国大争环境下的经济学。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系统而且丰富的经济学思想和理论，并在列国大争的环境下进行了相应实践。但随着秦汉的统一，一个中央集权大国的形成，列国经济学渐渐式微。《管子》中系统完整的经典经济思想被束之高阁，数千年来鲜为人知晓。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以一个鲜有竞争对手的东方大国面貌而存在。因物产丰富、地域广袤，经济自成一体，国际往来不多，外部贸易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中国古代的经济学家根本不需要《管子》的经济智慧和理论。甚至到了清代，皇帝居然傲慢地认为天朝帝国物阜民丰，对外部贸易不屑一顾。

清代以前的中国，根本不考虑到外部世界寻求财富，这和贫穷的欧洲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五百多年以前，欧洲人考虑的是如何到外国寻求财富，如何赚取他国的财富，所以有哥伦布和麦哲伦飘洋过海，四处探险的壮举。当时的中国考虑的则是如何在内部发掘财富。正是这两种不同的心态，导致东西方在近五百年间实力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为什么中国与欧洲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经济学思想呢？这还要从地理禀赋、国家形态去找原因。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欧洲小国林立，而中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大国。多个小国的经济交流，使用的是列国经济学；一个大国自成一体，奉行的是独立的帝国经济学。

帝国经济学和列国经济学便是中国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分野！

等到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大门，被动地参与国际贸易时，一切都落后和被动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像一头大象，开门闭门，闭上门感到不行又打开大门。最近这次打开大门后，中国又有失去自我而盲从之虞。

譬如，这三十年间，中国拼命赚外汇，赚到后来，突然发现拿到手中的一堆美元成了具有极大贬值风险的纸。十多年来，中国拼命追求出口，拼命追求外向经济，拼命奉行高储蓄的重商主义，但等到外汇储备多得不得了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落入了西方精心设计好了的财富陷阱。

为什么中国会陷入到这种境地呢？归根结底是中国丢掉了老祖宗早就擅长的列国经济学。

所幸，在经济思想领域“西风压倒东风”的时下中国，居然还有几个不盲目跟风、潜心研究自己历史文化的学者，翟玉忠先生就是其中一位。这些学者和当今那些崇圣的后儒们还有所不同，他们不是闭门只研究自己的老祖宗，而是同时研究西方的理论和实践，站在世界的角度，以宽阔视野和博大胸怀对东西方不同经济体系的特点进行了对比。他们融汇东西，出入古今，而非孤芳自赏，闭门造车，自吹自擂，这是他们与一批新儒家学者很大的不同点。

与时下风头甚炽的国学派和国故派不同的是，翟玉忠先生这样一批人，研究的是经济智慧，不故弄玄虚，不吓唬人，而是实实在在地搞东西方比较，发扬各家之长，摒弃各家之短。这或许就是经济研究工作者与文化研究工作者的不同。因此，在当前国内一片国学热的时候，我比较欣赏翟玉忠先生这些人的学风。我们必须恢复文化和心理上的自信，全力保护我国的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

然而，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一直以来被肢解，被矮化，甚至被某些“学者”目为小农经济时期的经济学。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我认为应当这样来看待：方法随着时代变迁是会过时的，但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就像太阳早晨升起晚上落下，周而复始一样，困扰人类的一些古老问题并没有变化，比如齐桓公问管子的那些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国发展的头等大事。

在《管子·地数》一章里，桓公问管子：“吾欲守国财，而毋税于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桓公说：我要保住国内资源，不被天下各国捞取，反而要外取于天下，可以么？管子回答：“可，夫水激而流渠，

令疾而物重。先王理其号令之徐疾，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矣。”这一段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要想既利用外力，又保住本国财富不外流，那就要制定出好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法令。

这就是列国经济学的主旨思想，即在竞争发展中，既要利用外国资源，使本国经济得到发展，又要保住本国资源和财富，不要轻易流失到外国。

我们目前在反思发展模式和发展思路，其实就是缺少齐桓公这一思想和管子的对策！

总的来说，我们今天从中国古典经济学中寻找的智慧主要有三点。一是竞争之道，即列国经济学。尽量地利用他国，而不是让他国利用。二是平衡之道，即货币与实物的平衡。不爆发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不让外国货币狙击本国货币。第三是减少发展的不均衡，避免贫富差别，即管子的“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明白了这三点，中国人在国际竞争的舞台上便有了主心骨，中国便有可能打赢今后的国际经济战争。

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界，最应搞明白的是列国经济学与帝国经济学的差异，二者的内涵和操作方法完全不一样。帝国经济学是一个局部总量平衡的经济学，易于调控，而列国经济学是没有宏观总量平衡的经济学，其操作手法与帝国经济学的方法完全不一样。就像当今的世界，货币的总量完全没法控制，各国都在打货币战。这个时代中国人如果还按贵金属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行事，必然吃亏。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中国付出了沉重代价，从这个意义上讲，翟先生的这本书出晚了，但经历了惨痛教训之后再来发掘中国古典经济学的时代意义，为时未晚，并且中国的觉醒还远远不够，翟先生这样的学者还是凤毛麟角。作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重要课题成果，本书的出版将对广大有独立意识、独立人格的学者产生更多启示。

这是我的祝愿，也是国民的殷盼！

序二 动态平衡经世济民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梁

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不乏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也不乏杰出的经济专家和治国能臣，在中国土地上产生过不止一部“国富论”，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管子·轻重》十六篇，其中蕴含着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的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

诚如翟玉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动态平衡思想一直是中国经济理论的核心。我们的祖先自觉地用“辩证施治”的眼光，观察复杂的社会经济运动，给出相应的政策药方。中国古典经济学的系统方法论，和偏重机械唯物论方法的西方经济学相比，自有其高明之处。当然，这不否认我们有必要学习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诸多合理部分，但学习是为了根据实际国情，解决中国问题。

国家统制货币发行，控制大宗必需品价格，以稳定物价、平衡财政、抑制贫富差距。这是中国古代治国贤臣的基本主张。翟玉忠先生将之精炼地总结为：“公私相分，国家参与其中并主导的市场经济。”

唐代著名的理财家、史学家杜佑所作《通典·卷八·食货八·钱币上》曾引《管子·国蓄第七十三》中的话，从他的自注中，我们能清楚看到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对中国经济思想的持续影响。上面说（括号内文字为杜佑自注）：

管子曰：“人君铸钱立币，人庶之通施也。（钱币无补於饥寒之用，人君所立，以均制财物，通交有无，使人之所求，各得其欲）人有若干百千之数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利有所藏也。（人事谓常费也。言人之所有多少，各随其分而自足。君上不能均调其事，则豪富并藏财货，专擅其利，是故人之常费不给，以致匮乏）然则人君非能分并财利而调人事也，则君虽自为铸币而无已，乃使人下相役耳，恶能以为理乎？”（言人君若不能权其利门，制其轻重，虽铸币无限极而与人，徒使豪富侵夺贫弱，终不能致理也）

在一定程度上，上述政策思想同样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曾得到充分发扬；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解放区政府控制了主要大宗商

品和流通主渠道，实行“外贸统制”，作为独立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支柱。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即使没有黄金和外汇储备，解放区也能通过控制边币供应量，稳定币值，发展经济，保障供给。

也正是在这一前提下，在新中国初创阶段，政府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一举取缔金融投机、遏制恶性通胀，迅速恢复生产，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新中国杰出的经济领导者所提出的综合平衡思想，即“物质生产自身平衡、实体经济循环与货币循环平衡”，也就是工业化建设时期的动态平衡理论。

动态平衡，同样体现在制度安排和社会政策方面。过犹不及，凡事要讲“度”。商人的牟利动机本是经济活力的基础，但如果放任其唯利是图的本性，必然损害社会公益、扩大贫富鸿沟，所以要节制资本。由于经济活动日趋复杂，政府的宏观调控任务愈益繁重，但对微观活动干涉过分则压抑活力。如何把握好二者的边界和“度”，不能靠外来的或“钦定”的本本，而要根据具体条件与国家目标，灵活调整。

经济科学工作者的任务是经世济民，追求民富国强。科学研究的本质是探求真理，社会科学的真理本身应该是朴素的，易于为广大人民理解、有益于广大人民的。深一步研讨中国古典经济学的宝贵思想，对当代现实经济社会运动，有着独到的启发意义。

在此意义上，翟玉忠先生的这本书特别值得广大学人重视。

无论是春秋管仲、西汉桑弘羊、唐刘晏、北宋王安石，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陈云、薛暮桥，都成功运用以《管子·轻重》诸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治世济民，解决当时经济难题。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化和一百多年的西化肢解了这一伟大思想，我们有必要还原其不朽的真实面貌，发掘其辉煌的现实价值。

目 录

导言篇	1
第一章 经典的力量	1
经济动态平衡思想	3
所谓“物资本位”货币	6
盐等重要物资的专卖政策	18
第二章 重回大汉王庭，找回经济思想原典	21
什么叫乘马	25
什么叫轻重	31
什么叫九府	34
第三章 为何国人失去对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记忆	44
儒家重义轻利	45
经济思想的全盘西化	47
理论篇	50
第一章 计划与市场之间——国家参与其中的市场经济	50
市场之道：公私相分，国家参与其中并主导的市场经济 ...	50
自然原则：按自然的时序和生产能力组织经济生活	56
均平原则：损有余补不足，实现社会动态平衡	58
储备原则：国家积累和储备的重要性	62
第二章 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中国古典外贸理论的基本原则	66
孔子为我们留下的历史谜团	66
“伊尹之术”背后的中国古典外贸理论	69
内守国财而外因天下	71
第三章 政商革命——中国古典经济理论中的政商关系	72
“富人薄命”	72

资产阶级是必须的吗	73
新“大商”时代	78
第四章 “按劳分配”与“社会功勋制”	81
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	81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中的社会功勋制	83
现实生活的社会功勋制	87
第五章 期货与中国古典经济制度常平仓	90
期货市场是把“双刃剑”	90
人类历史上最有效的平抑物价机制常平仓	92
常平仓与现代社会	95
第六章 历史的蝴蝶效应：西汉盐铁会议与近代西方经济学 ..	97
历史永远定格于公元前 81 年	97
盐铁会议的缘起	98
盐铁会议的始作俑者霍光	100
历史的蝴蝶效应	101
第七章 中国古典政治经济理论与合作主义	105
失踪的文明大陆	106
合作主义的主要思想源头	111
东西方“职团”	115
权谋篇	119
第一章 写在本篇前面	119
第二章 《管子·轻重甲第八十》十二计	121
《伊尹之谋》案例分析	121
《商汤之谋》案例分析	124
《士室之谋》案例分析	128
《杠池之谋》案例分析	132
《鹄鹄之谋》案例分析	136
《五吏之谋》案例分析	139
《水豫之谋》案例分析	142

《北泽之谋》案例分析	146
《北郭之谋》案例分析	150
《渠展之谋》案例分析	153
《癸乙之谋》案例分析	157
《怀夷之谋》案例分析	162
第三章 《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六计	166
《素赏之谋》案例分析	166
《曲防之谋》案例分析	170
《置屯之谋》案例分析	173
《城藏之谋》案例分析	177
《耜铁之谋》案例分析	181
《曲衡之谋》案例分析	185
第四章 《管子·轻重丁第八十三》十三计	188
《石璧之谋》案例分析	188
《菁茅之谋》案例分析	192
《栈台之谋》案例分析	196
《纂苳之谋》案例分析	202
《籍谷之谋》案例分析	206
《谢物之谋》案例分析	209
《彗星之谋》案例分析	213
《城阳之谋》案例分析	216
《崢丘之谋》案例分析	220
《抗庄之谋》案例分析	224
《沐树之谋》案例分析	228
《困京之谋》案例分析	232
《三原之谋》案例分析	235
第五章 《管子·轻重戊第八十四》五计	240
《制鲁梁之谋》案例分析	242
《制莱莒之谋》案例分析	246

《制楚国之谋》案例分析	249
《制代国之谋》案例分析	253
《制衡山之谋》案例分析	256
主要参考文献	260

导言篇

第一章 经典的力量

如同两千多年前成书的《黄帝内经》依旧指导着当代中医的实践一样，以《管子·轻重》诸篇（一般称《轻重》十六篇，加上《乘马第五》，实际还存十七篇）为核心的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两千年来也在以隐性或显性的方式指导着中国人的经济生活。

任何伟大的经典理论都不会随时间而褪色。在中国历史上，从春秋时的管仲到西汉的桑弘羊、唐代的刘晏，再到北宋的王安石，他们的思想都带上了“管商之术”的色彩。任继亮先生指出，解放初治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时，陈云和他的同志们也用了管子的轻重之术。他说：“关于通过市场对货币与粮食的运作，就可促使价格发生变化，《山国轨》有个说明……以现代经济为例，在1950年前后，我国政府接收蒋政权的烂摊子，蒋管区物价严重膨胀，民不聊生。我们新中国当时采取很多措施，其中对于治理通货膨胀，包括通过货币改革和适当抛售物资、回笼货币的政策，稳定了市场物价，取得非常理想的效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币轻万物重的局面。”[1]

国外有经济学家对当时中国人治理通货膨胀的奇迹大惑不解，他们甚至认为谁能从理论上诠释这一奇迹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也能发给逝者的话，看来瑞典国主要穿越时空，给两千七百年前的管仲颁奖了！

当时，著名经济学家杨培新之子、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斌先生曾这样讲：建国初期，杨培新作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的业务秘书，直接参加了陈云同志领导下的稳定财经工作，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国民党常年没有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问题都治理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面临着数千万知识青年返城的待业困难，还有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隐性通货膨胀压力，当时有人主张按照西方货币主义理论紧缩货币供给，为控制通货膨胀不惜加重就业困难，但杨培新却主张适度扩大银行信贷规模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支持国有企业面向市场扩大消费品生产，迅速繁荣市场并缓解了通货膨胀

压力，同时又通过发展生产解决了数千万知青的就业问题。按照西方传统的线性思维和流行的货币主义理论，治理通货膨胀必带来失业，反过来，解决就业问题必然带来通货膨胀，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同时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是不可能的。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恰恰在很困难的情况下做到了这一点，令许多西方著名经济学家赞叹不已。杨培新在应美国联邦银行邀请访美期间，曾遇到现代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

（MiltonFriedman），后者对中国治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成就也非常钦佩，他称倘若谁能解释中国的成功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2]

当代最成功应用中国古典经济理论的是经济学泰斗薛暮桥。

薛暮桥（1904—2005年），原名雨林，江苏无锡人。他的主要经济思想是1943年至1947年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斗争实践中形成的。当时他先后任中共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省工商局局长、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多年以后，薛暮桥在回忆录中深情地写道：“在这一时期的经济工作实践中，我对经济科学的一些基本问题，特别是货币、物价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我提出的关于抗币的‘物资本位’理论,关于纸币流通条件下物价与货币发行同步变化的规律，关于纸币流通中不是‘劣币驱逐良币’而是‘良币驱逐劣币’的规律，以及通过控制纸币发行进行宏观调控的政策等，都是在实践中形成又反过来对实践起了指导作用……到建国以后，在我的经济工作和理论研究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和深化。”[3]解放后，薛暮桥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秘书长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对共和国经济建设和中国当代经济理论建设居功至伟。2005年3月，在他逝世前几个月，获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薛暮桥近乎“照本宣科”地应用了中国古典经济思想，但他却一直不知道自己经济思想的源头。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理解薛暮桥的经济思想和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关系，我们将二者做如下对比：

经济动态平衡思想

从《管子》到薛暮桥，动态平衡思想一直都是中国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这种平衡不仅包括经济与自然之间的平衡，也包括经济结构本身的平衡发展以及经济体系内阶层利益的平衡。

当代中国杰出的经济领导人陈云在 20 世纪 50 年代就明确提出了“三大平衡”的思想，即财政、信贷、物资各自平衡和统一平衡。20 个世纪 70 年代末又加上了外汇收支平衡，成为“四大平衡”。这一理论的基础是物资与货币间的平衡，也就是周景王二十一年（前 524 年）单旗所谓的“量资币、权轻重”[4]。1957 年 1 月 18 日，陈云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言说：“财政收支和银行信贷都必须平衡，而且应该略有结余。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5]

1962 年，面对“大跃进”后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陈云又进一步解释说：“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按比例，就平衡了。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离开别的部门。一部机器，只要缺一部分配件，即使其他东西都有了，还是开不动。按比例是客观规律，不按比例就一定搞不好。”[6] 1979 年 3 月 14 日，他与李先念联名向党中央写信，指出：“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7]

陈云的上述思想凝结着中国第一代领导层的集体智慧，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具有“王官学”的意味，就是说经济平衡理念是当时国家经济政策的指针。1959 年 1 月 7 日，担任重要经济领导职务的薛暮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的高速度和按比例发展》一文，其中特别强调了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利用不平衡实现相对的动态平衡。他写道：“国民经济的发展从比较长的时期来讲，必须保持平衡；但从每一个片断来讲，则常常是不平衡的。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现象，而不平衡则是绝对的、经常的现象。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掌握不平衡的规律，来不断地注意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求得相对的平衡。过分强调平衡，要求做到时时平衡、处处平衡，就必然会限制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但是，如果平衡破坏，也就

会影响国民经济前进的速度，甚至根本不能前进。从这方面来讲，保持平衡也是为着保证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8]

中国古典经济思想同样强调经济平衡、平准的意义。司马迁做《史记·平准书》进行了专题讨论。自此以后，后世言经济者常常提出“平准”问题。《管子·轻重》诸篇的重要篇章《国蓄第七十三》认为，财富不足、人民困窘主要是因为国家没有有计划地平衡经济生活，使某一部门（常常指商业）取得暴利：

岁适美，则市梟无予，而狗彘食人食。岁适凶，则市余釜十絙，而道有饿民。然则岂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赡也哉？夫往岁之梟贱，狗彘食人食，故来岁之民不足也。物适贱，则半力而无予，民，事不偿其本；物适贵，则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则岂财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时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于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余。夫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敛积之以轻，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财之横可得而平也。

意思是说，“年景遇上丰收，农民粮食卖不出去，连猪狗都吃人食。年景遇上灾荒，买粮一釜要花十贯钱，而且道有饥民。这难道是因为地力不足而粮食不够吃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往年粮价太低，猪狗都吃人食，所以下一年的民食就不足了。商品遇上落价，就是按照工价的一半也卖不出去，人民生产不够本钱。商品遇上涨价，就是出十倍高价也买不到手，人民需要得不到满足。这难道是由于东西本来太少，生产和贮存不够所造成的么？这是因为错过了调节人民财利的时机，财物价格就波动起来。所以善治国者总是在民间物资不足时，把库存的东西供应出去；而在民间物资有余时，把市场的商品收购起来。民间物资有余就肯于低价卖出，故君主应该以低价收购；民间物资不足就肯于高价买进，故君主应该以高价售出。用低价收购，用高价抛售，君主不但有十倍的盈利，而且物资财货的价格也可以得到调节后的稳定。”

显而易见，这里平衡粮价不仅是为了使经济稳步发展，也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可谓一举两得。但平衡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和动态的，粮价要有高有低才行。《管子·轻重乙》中特别提到了这个问题：

桓公问于管子曰：“衡有数乎？”管子对曰：“衡无数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则衡数不可调耶？”管子对曰：“不可调。调则澄，澄则常，常则高下不贰，高下不贰则万物不可得而使用。”

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就是，桓公问管仲：“平衡供求有定数么？”管仲回答说：“平衡供求没有定数。平衡供求，就是要使物价有高有低，不经常固定在一个数字上。”桓公说：“那么，平衡供求的数字就不能调整划一了么？”管仲回答说：“不能调整划一，调整划一就静止了，静止则没有变化，没有变化则物价升降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各种商品都不能被我们掌握利用了。”

经济平衡的目的还在于节制资本，做到“贫、富有度”（《管子·五辅》），防止“蓄贾游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管子·国蓄》），维系商业与农业之间的平衡。值得指出的是，薛暮桥和《管子》的作者都看到了商人唯利是图的本性，主张利用其积极的一面，并不主张消灭资本。

1945年4—5月，薛暮桥在向山东分局、山东省政府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商人要一面团结，一面斗争，奖励其一切有利于抗战和人民利益的活动。”“商业资本是国民经济之一必要构成部分，如果商品经济继续发展，商业必然也就跟着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又应认识商人唯利是图，他们的活动对于抗战和人民有时有利，他们的政治态度同样也是两面性的。”[9]

《管子》的作者也认为，尽管商人唯利是图，但他们对国家经济生活是有利的。《管子·侈靡第三十五》说：

商之于国，非用（庸）人也，不择乡而处，不择君而使，出则从利，入则不守。国之山林也，取而利之。市廛之所及，二依其本。故

上侈而下靡，而君、臣、相上下相亲，则君臣之财不私藏。然则贫动肢而得食矣。

意思是，“商人对于国家，并不是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居处不挑选什么乡，侍奉不挑选什么君主。他们卖出就是为了谋利，买进也不保守惜售。国家的山林资源，取过来就去营利，使国家的市场税收成倍增长。朝中上下都可以奢侈消费，君、臣、相上下相亲，君臣的财产都不会窖藏不动，这样贫民也就有工作而有饭吃了。”

《管子·禁藏第五十三》中说：

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

即为，“商人做买卖，一天赶两天的路，夜以继日，千里迢迢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

薛暮桥时代的工业经济比管子时代的农业经济虽然要复杂得多，但在经济体系不同部门、不同阶层间的动态平衡思想却是不变的，这也是中国古典经济思想的永恒生命力所在。

所谓“物资本位”货币

名实不符的“物资本位”货币

薛暮桥的“物资本位”理论直接来自 20 世纪 40 年代初他在山东管理货币的经验。当时山东有三种货币：一是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货币，叫抗币；二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叫法币；三是日本扶持的伪政府发行的伪币。1941 年，缺乏金融经验的山东省政府企图用行政手段压低法币、禁止伪币，但效果极差，黑市流行，且伪币币值最高、法币次之、抗币最低。

薛暮桥和他的同事们意识到，要稳定物价就必须驱逐不断涌入的法币。1943 年 6 月，他们在报纸上宣布，从是年 7 月 1 日起停止使用法币，人们可以用法币换抗币。同时，根据地的银行也不再以法币作发行准备金，而是将这些法币从敌占区换回大量物资。有了这些物资，就能支持抗币的币值。他写道：“排挤法币使我们换回大量物资，能够用于支持抗币，在物价上涨时抛出物资，回笼货币，提高抗币的币值，物价就自然回落。”[10]

实际上这就是《国蓄》中所说的：“夫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人君知其然，故视国之羨不足而御其财物。”

驱逐法币的经历丰富了薛暮桥管理货币的经验，他提出了自己的经济管理理论，其基本要点是：将银行发行的一半货币直接给工商局，让它购买主要商品，并赋予工商局吞吐物资的功能。他总结说：“由于根据地是在农村，货币发行应当有季节性。秋冬增发抗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到春荒时期，则应抛售农产品，回笼抗币。这样来保持物价的常年稳定。因此，省政府决定加强工商局，使它有力量吞吐物资，稳定物价；并决定银行发行的货币必须以一半交给新成立的工商局，用来收购各种农产品，随时吞吐，以此稳定物价。我们发行的货币没有用黄金、白银、外汇作储备，是用物资来作储备的。随着物价的涨落，工商局随时吞吐物资，调节货币流通数量，以保持币值和物价的稳定。当时各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金本位制，不会发生通货膨胀问题。我们这种从实践中取得的规律性的认识，可能是货币学说史上的一个新的发现。”[11]

薛暮桥讲过这样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1945年日本投降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以记者名义去山东访问他，认为山东既无金银储备，又无外汇储备，能保持币值和物价稳定，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薛暮桥当时回答说：“我们采取的是‘物资本位’。抗日民主政府控制货币发行数量，勿使超过市场流通需要。我们每发行10000元货币，至少有5000元用来购存粮食、棉花、棉布、花生等重要物资。如果物价上升，我们就出售这些物资来回笼货币，平抑物价。反之，如果物价下降，我们就增发货币，收购物资。我们用这些生活必需品来作货币的发行准备，比饥不能食、寒不能衣的金银优越得多。根据地人民是欢迎我们这种货币制度的。他们不要黄金，更不要美元和英镑。”

[12]

当时这位经济学家还问薛暮桥，美国能不能也实行这种制度，薛暮桥回答，美国现在掌握着世界2/3的黄金，还可以实行金本位。不过他在回忆录中惊叹：“当时我万万料想不到，三十年后美国也被迫